

评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

洪迎华

十多年前，尚永亮先生以他的一篇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初版，后经修订，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为题，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使得贬谪与贬谪文学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历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和坚守，新近又推出了由他主撰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简称新著），可谓拓荒之后的又一大创获。其开山之作曾选取中唐元和时期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五大贬谪诗人为考论对象，透析元和贬谪文学的特质和文化精神；这部新著则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整个唐五代，予以掘进和突破，全面建构了唐五代贬谪文学研究的立体框架。

新著洋洋50余万字，以六编、十六章、五十五节统领全书。第一编立足于体系的建构和面的铺展，从历史文化角度深入辨析了唐五代贬谪的基本范围、构成因素、贬官类型及规律特点，对唐五代贬谪制度与逐臣类型进行了总体考察。第二编到第五编，则以贬谪文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分别对唐之初、盛、中、晚各期的逐臣与创作展开论述。为避免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各期均从政治、地域、文学等文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选取了最具典型意义的逐臣和文人群体，以突出其重点和特点。如初唐选取因在政治上依附二张而同时被贬的以沈、宋为代表的神龙逐臣群体，盛唐选取开元、天宝年间因吏治与文学之争而接连被贬至今湖北、湖南地域的张说、赵冬曦、张九龄、王昌龄、崔成甫、崔国辅、贾至等荆湘逐臣群体，中唐选取在当时政治、文化、文学创作上最具代表性的韩、柳、刘、元、白等元和逐臣群体，晚唐选取相关资料较丰富、贬例较典型的钱珣、吴融、韩偓等乱离逐臣为对象，从而将各时期复杂零散的文人贬官现象，以群体的视角予以提炼、整合，而又于群体中突出个体，通过个体管窥群体和整体，遂使得各期逐臣及贬谪文学之风貌在纵深考索中得以披露和彰显。各期分段考察之后，第六编又以唐五代逐臣创作最具特色的别诗为切入点，兼及贬谪文学的主体和侧翼，探究

其基本情形、回归情结、艺术表现和传播特点。综观全书，点面结合，考论并重，又有贬谪文化之先后嬗变这根“主线”贯穿其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著已形成一部唐五代贬谪文学史的宏观框架和微观详论，从而完整地勾勒出唐五代逐臣的心态史和创作史。

对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而又与政治、文化、人生紧密相关的课题有深入的掘进和斩获，光有一个好的框架、视角远远不够。新著之所以骨体坚实、血肉丰满，有这样几个成功之处深可注意和借鉴。

一是实证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既重基本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亦重发生原因的探寻和论析；既具有局部考证的坚实可靠性，又具有整体理论观照的深刻性。新著始终秉持一份“依材料说话”的精神，重视实证，凭据立论。如第一编总体考察唐五代四种贬谪情形（既降品秩又远迁异地者、降秩而不出京者、不出京或出京品秩不降而投闲置散者、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和四种主要的贬官类型（左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流人），即是对大量文献材料梳理后得出的精要概括。而对节度、刺史、东都分司官等几种外任是否能视之为贬，作者更是以具体材料、实例为基础，予以实事求是的辨析，故而结论令人信服。又如第二编中的“神龙逐臣人数及流贬地域、路线考”，则细化到贬谪人员的具体名单、贬所路程的远近、逐臣所走路线、所费时日等方面，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态。当然，新著绝不仅限于材料的梳理和史的考证，其中对史实的阐述往往是和文化背景与动因的分析、多方位的理论观照结合在一起的。如第一编专列“唐五代各朝贬官概况”一节，依据多种文献，详述了唐五代二百四十余年每朝的贬官数量、先后变化、与政治的关联及其异同；该编第三章以“唐五代贬谪的规律与特点”为题，从朝代更迭、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几方面探讨影响唐代贬官的深层因素，并由此概括出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等显著特征；而在此后诸编诸章节，更从政治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贬谪诗人赖以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文化活动、文化建

树、参政意识以及政治悲剧的性质,对他们被贬原因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予以新的斟辨和阐释。除此之外,还从地域学、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贬官特点,如第三编“盛唐贬官特点与荆湘地域的文化特征”一节,第五编“文人群体的政治边缘化及其类弃逐体验”一节。如此多端的理论视野和深层阐发,皆使得新著对贬谪这一历史现象的观察有了洞悉力和厚重的学理深度,显示出作者扎实深厚的学识,及谨严与开拓并存的治学风貌。

二是对逐臣创作及心灵律动的“同情”解会和透彻体察。从本质言,文学是生命意志与情感的音符,而贬谪是被贬者个体生命的沉沦,表现为生命形态由高向低的跌落,以及在此过程中受到的磨难,从而最易催发人的生命碰撞和情弦波动,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曾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迁谪”即位列其中。而要真正抓住贬谪文学背后最本质的动因和生动丰富的内涵,就必须用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对超越了文学形式的人生具有深入的理解与同情。正是立足于此,尚永亮先生多年以来对贬谪主题用力甚勤,亦显示出其治学在此方面行家里手的擅长。其分析元和逐臣在贬所这一异质文化环境形成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乃至性格变异,及其在逆境中突显的意识倾向和消解因素、脱离谪籍后所发生的诸种心态变化最为精彩。王兆鹏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评论说:“作者像是精神分析医生,结合诗人的作品,借助现代心理分析的理论,逐一剖析了元和五大贬谪诗人在贬所种种复杂的心态及其变化,心理分析的结果是那样的新颖透彻,又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他好像不是分析古人的心理,而是对熟悉的心理咨询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诊断。”(《尚永亮先生〈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读后》,《博览群书》2003年12期)一般来说,凡受贬的文人都会有相同的心理体验,如愤懑、惊恐、呼屈、苦闷、悲伤、怀归等等。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从这些层面概括立论,而是紧扣历史背景、出入具体作品,挟以同情之心、身临其境地体察各被贬者的感受和心态,其笔触亦常饱蘸情感。如其分析柳宗元《囚山赋》所表达的被拘囚感时写道:“这里,四周环抱,绵延透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阳相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成了一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极呢?”又如剖析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诗中的乡国之念时说:“传闻大雁南飞至大庾岭便折回,而自己却不能停止南迁的脚步,远望前程,诗人哀叹归期无望,岭南又瘴气氤氲,使他对未来的生活更添焦虑。明晨就将进入南国,那时在开满梅花的山岭上回望故乡,又该是何等况味呵!”正因为有了如此的“了解之同情”,加之作者对心理学、人格学等理论的谙熟和信手征引,其对被贬者心灵历

程的剖析可谓切肤入微、鞭辟入里。作者既能入乎其中,在群体心态下细密地比较出个体的不同,如盛唐荆湘逐臣孤直情怀中张说之失落、张九龄之孤独、王昌龄之执著,元和逐臣“被弃感”这一共同心态下各人因生命沉沦程度、谪居生活时间长短而显示出的差异,从而以一个个生命鲜活、个性饱满的贬谪个体,汇成了一部唐五代文人逐臣心态史;又能出乎其外,以文化精神的探照贯穿其中,由此见出时代的差异。如初唐神龙逐臣多关注于一己命运的思索、个体人生的感喟和怨嗟,故而缺乏广远的时空视界和顽强的人生态度;盛唐荆湘逐臣虽遭到贬谪之苦,有个体人生跌落的悲情,但他们的苦闷多是未失去理想的志士的苦闷,表现出在逆境中有所沉潜但并未失落豪情的精神风度;中唐元和逐臣因有了辅时救弊的激切心态和参政实践,故在万死投荒的生命沉浮与煎熬中倍显激越悲壮的时代气质;晚唐乱离逐臣则在唐末士人群体性生命沉沦的境况下,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和悲剧精神的消解。类此精到的识见、透辟的阐释,显然已超出了一般心灵探寻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唐代人文精神和文化史的书写,显示了研究的大气和高瞻。

三是对贬谪文学的全新阐释和深细把握。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艺学研究当属最本位的层面。新著第二编至第五编皆列专章对不同时期贬谪文学内涵和风格的变化进行考察,第六编又专对唐五代逐臣别诗进行个案研究,即体现了其关注重心和用力所在。因有了“文人逐臣”这一新视界的建构,各时段文学研究中的观察视角、群体概念和研究结论的提出,均让人耳目一新。如初唐神龙逐臣群体和盛唐荆湘逐臣群体,即转换了学术界过去多从律诗体制发展、宫廷诗或“初唐四杰”分析初唐诗歌,从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解读盛唐诗歌的传统视角和格局,得出了极富创见性的结论。作者认为,以沈宋为代表的神龙逐臣的文学创作,和初唐四杰一样,同样反映了唐诗由宫廷走向现实生活和个人情致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拓展诗歌题材、深化诗歌情感、完善诗歌艺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张说、赵冬曦、张九龄、王昌龄、崔成甫、崔国辅、贾至这一张新名单组成的盛唐荆湘文人逐臣群体,其创作“尽情展现了以屈贾情结为重心的哀怨情怀和悲剧精神。这个贬谪群体的痛苦和在痛苦中坚守的乐观豁达都带有盛唐士人所特有的风貌,并为盛唐诗歌增添了一种新的特质”。这些观点,发前人之未发,不仅是对唐代贬谪文学的价值发现和崭新阐释,也改变了我们对初盛唐诗坛的既有认识,可以说是对整个唐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在对贬谪文学艺术特征的把握中,作者避免了泛泛而谈或笼统归纳,而是从诗歌意向、语言用字等具体环节入手,抽绎出前人未曾注意的艺术特色。如元和逐臣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自我的生命置于广阔遥远的空间和悠久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它的沉沦色彩;用大量伤禽、笼鹰等意象,借以表现自我生命之受创、被囚的程度;柳宗元对色彩幽暗、形象尖利词语的特

别爱好,刘禹锡对秋季苍鹰、骏马等客观对象物的频繁选用,既有效地提示了其心理性格,也最大限度地成就了其独特的文学风貌。至于逐臣别诗中白首、孤舟、江流、猿啼、酒、泪、春草诸意象的多次出现及“柳”意象的罕见,均可管窥逐臣别诗与普通别诗之不同及其情感程度的差异。这些艺术特色的发现和总结,使得文艺学层面的研究得以细化,也体现出研究者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感悟力。

当然,一部论著的成功,往往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成功。研究方法的科学新颖和多样化也是新著一大特点。新著中可见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如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比较学、传播学、接受学等,所需之处,因事制宜,灵活运用,以获得最佳的学术视点和研究效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计量分析法的引入和采用。为了说明和发现问题,新著列出了大量数据和多种统计表格,对相关论述和观点提供支撑。如总体考察一编,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斟辨统计,得出唐五代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 2828 人次(其中文人贬官共 1040 人次)这一数据。并借助多个图表,从时期分布、地域分布乃至同一行政区域之不同州郡分布量的差异展开细密分析,得出结论:中、晚唐是贬官人数最多的时期,其中尤以宪宗朝、文宗朝、宣宗朝、懿宗朝、德宗朝为最;南方较之北方,岭南道及江南西道较之其它诸道,流贬人数更为集中;而就此两道论,江南西道虽然在贬官数量上不及岭南道,但由于二者在具体地域的分散和集中度上有大的差别,故江南西道多数州的贬官人次均远超岭南道相关州的数量,由此形成唐五代贬官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由于数据坚实,分析具体,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以往笼统的、印象式的认识,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数据参照。

唐五代逐臣别诗研究一编也显示出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作者对唐五代逐臣别诗及回归别诗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得出逐臣别诗创作的高潮在中唐、而回归别诗创作的巅峰在盛唐的结论,并对其成因予以论析。这个新问题的提出无疑得益于新方法的运用。其实,关注尚永亮先生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他对计量分析这一研究方法有不断成功的实践,先后撰写了《八代诗歌分布情形与发展态势的定量分析》(《东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唐知名诗人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

2003 年第 6 期)、《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江海学刊》2005 年第 2 期)诸文,并撰《数据库、计量分析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评论》2007 年第 6 期)一文对其进行理论层面的阐述。他认为:“数据是证据的延伸和扩大,建构古代文学专业数据库是学术研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则既构成传统历史文化研究法的一大辅助和补充,也成为使学术研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从重数据这点上再现了作者的科学求实精神,同时也在方法论层面为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作了有益探索。

为新著增添了新意和亮彩的还有传播学和接受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传播和接受两者互为因果、彼此包容。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学界对文学及文学史的关注研究,逐渐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很多传统论题在转变观察视角后又显露出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尚永亮先生早在十年前即以其《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年版)将传播接受理论与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予以成功的对接,而在新著中,他又将这种方法带入贬谪文学研究,借助传播学理论考察逐臣别诗,认为别诗在传播上的意义和作用,影响了这些作品在结构、用韵等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和独特风格,而逐臣别诗在艺术上取得的进展和独创,又转而促进和提高了诗歌的传播效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谈到因依附权贵、谄媚谀主而被贬的神龙逐臣于诗中流露出一种忠而被谤的愤懑和幽怨心态时,作者指出这亦是一种基于拯救目的的传播需求。凡此诸多结论,皆是立足于新视角而得出的新观点,深化了我们对逐臣创作的艺术认知和文化认知,亦充分展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特点和活力。

贬谪文学和贬谪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宽广而有待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追寻尚先生这些年的研究足迹,从《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到新著的推出,加上其在后记中提到正在撰写的《唐五代逐臣文学编年史》,可看出其逐步拓展、提升的趋势和一以贯之的专注。我们期待着他的新成果的出现,并向其致以敬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李超